

北京大学东北亚史研究丛书



战时体制下的日本妇女团体

(1931~1945)

胡澎◎著

在中国诗人笔下，日本女性是可爱的，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
风的娇羞。而当最早激励日本女性奋起的自
由民主精神被法西斯主义取代而代之时，似真
似幻的东洋之花立即变成了恶魔的化身，母
性变成了兽性的支撑，温柔、妩媚和幻美变
成了残酷、凶残、暴行和杀戮的兴奋剂和动
力源泉，甚至爱情都为鲜血和战火而迸发。这
一切，发人深思，更让善良的人们不敢丧失
对军国主义复活的警惕。

吉林大学出版社

献给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中国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

战时体制下的 日本妇女团体 (1931~1945)

胡 澎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时体制下的日本妇女团体:1931~1945/胡澎著.
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5.6

ISBN 7-5601-3248-0

I.战… II.胡… III.妇女-团体-研究-日本-1931~1945
IV.D443.1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49874 号

书 名:战时体制下的日本妇女团体 (1931~1945)

作 者:胡 澎

责任编辑:张显吉

责任校对:张红卫

封面设计:郭湘琪

出版发行:吉林大学出版社

(长春市明德路 421 号)

印 刷:北京市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80×1230 毫米 32 开

字 数:288 千字

印 张:10

版 次:200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2000 册

书 号:ISBN 7-5601-3248-0

定 价:20.00 元

序 言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两千多年间,和平交往乃两国关系的主流,国家级战争冲突的时间,全部加在一起,还不到40年。在近代史时期,日本军国主义恣意侵略扩张,从根本上堵塞了中日关系和平交往的主航道,并祸害东亚。特别是1931~1945年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留下了永远难以抹去的伤痛。与此同时,中国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胜利,也雪尽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国耻。中国作为新兴的世界级国家,昂首站立在东北亚。14年间的侵略与反侵略战争,对于中日两国来说,均属最能验证民族性格的非常时期。研究战时的日本历史,有助于深入了解日本国家和民族的昨天,审视今天并预测明天。因此,国内外史学界对14年战争期间的日本历史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

在诸多有关战时日本历史的学术成果中,胡澎博士奉献给读者的《战时体制下的日本妇女团体(1931~1945)》,因其“女性研究角度”而独具特色,别开生面。

这里所说“女性研究角度”具有多重含义。首先,它是以女性为研究对象的,涉及战时日本妇女社团活动的方方面面。如同作者所说,合法社团的成立是现代社会的普遍现象,与现代自由、平等、民主等体现现代性的价值观念密切相关。因此,日本妇女团体的产生与发展,理应对日本社会走向自由、民主与和平发挥积极作用,但战时日本妇女团体却适得其反。这种反常情况的发生恰恰表明对这一时期日本妇女和妇女团体的研究,具有进一步深入剖析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性质和战时体制危害的意义。

其次,它是从女性性别的立场与视角去观察和分析问题。所谓女

战时体制下的日本妇女团体

性性别的立场,主要是指男女平等、尊重女性人格的立场。由此视角出发反思战争与性别、民族与性别、国家与性别的关系;分析战争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日本妇女和妇女团体的地位和作用。在此,一些未被注意的新问题将浮出水面,一些鲜为中国读者所知的史料也得到发掘。

最后,它凸现了中国女性研究者的学术立场。即如作者自言:作为一名侵略战争受害国的女性研究者,可以摆脱日本学者难以跨越的民族感情的羁绊,生动而全面地再现历史的过去。同时,作为一名侵略战争受害国的女性研究者,也更有责任对战争期间日本妇女团体进行深入的探讨,总结历史的惨痛教训。从上述女性角度来把握战时日本历史,有益于扩大视野,也会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这个众所周知的历史产生新的认识。

除了在研究视角上表现的特色以外,《战时体制下的日本妇女团体(1931~1945)》的学术价值,还在以下三个方面值得关注:

其一,尊重事实,即真实地反映战时日本妇女团体演化的整体面貌。为了把握要领,作者建构了两条线索并行的论述框架。第一条线索是按照时间先后展开记述的纵向线索,分成昭和初期、“九·一八”事变到卢沟桥事变、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4个时期,探讨不同时期日本妇女团体的不同状况和特点。第二条线索是从妇女团体类型差异分析和比较的横向研究视角出发,以民间或官方两大类妇女团体的互动关系为中心,对下述有研究价值的问题作出了探索。这些问题包括:在日本走向近代化道路中受欧美进步思想影响而新兴的民间妇女团体,如何在侵略战争期间变节、转向而自我消亡;官方妇女团体却在为虎作伥中迅速膨胀,并吸纳民间团体,一统妇女界;主动与被动参加社会团体的日本妇女,如何通过有组织的活动,间接或直接为侵略战争服务;本应要求男女平等、争取妇女权益的妇女团体,如何沦为军国主义侵略战争机器不可缺少的构成部件等等。对于战时体制下日本妇女团体这一学术界涉足不多的领域而言,需要敢于探索的勇气,因为这实在是不下功夫则难见进展的烦琐工程。为了真实再现真相,作者利用赴日学术考察的宝贵机会,不辞劳苦,奔波于各大图书馆之间,查阅了大量战时日本妇女团体出版的机关杂志、妇女领导人在当时发表的文章

和演讲,以及在战后出版的回忆录等。有一份耕耘就有一份收获,仅就材料的搜集、翻译和耙梳整理而言,《战时体制下的日本妇女团体(1931~1945)》资料充足,为中国的日本史研究作出了有益贡献,并为今后深入研究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其二,明辨是非,即在理清事实的基础上,对战时妇女团体的各类活动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以正本清源。作者肯定了昭和初期日本民间妇女团体的进步作用,同时也指出战时日本妇女团体因现代性成分甚少,封建化、军事化成分过多,最终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欺压、杀戮弱小民族兄弟姐妹的帮凶。作者以史实为依据,认为:战时日本妇女在官方妇女团体的组织和动员下,支撑战时体制,开展包括慰劳官兵、资源回收、爱国储蓄、生活更新、女子挺身、家庭报国等“銃后奉公”活动。因此,日本女性和妇女团体参与战争既有被动的一面,也有主动的一面;她们既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又是侵略战争的加害者;日本妇女和妇女团体虽然不是发动侵略战争的决策势力,但对侵略战争的肆虐也负有应予反省的历史责任。此外,作者还对战争、和平、民族与性别的相互关系也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史论结合的论述方式,使《战时体制下的日本妇女团体(1931~1945)》颇具特色。

其三,推察因果,即揭示各种历史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此项有关日本女性团体兴起的研究中,作者提出近代以来日本妇女历史受到近代和传统两大因素双重作用的观点。一方面,明治初年的文明开化运动期间,在西方进步思想影响下,日本妇女接受了自由民主、博爱幸福、男女平权的思想。近代以来,以日本妇女参加自由民权运动或发起女权主义运动、以争取参政权为中心的妇女运动,均为欧美近代进步思想浸润的结果。另一方面,以父权家长制为特征的家族制度、近代天皇制、贤妻良母主义、国家主义等传统因素,也制约着日本妇女的思想和行为,是导致日本妇女团体沦为法西斯主义帮凶的重要原因之一。曾经在大正民主时期高举妇女解放和社会改造旗帜的妇女团体,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居然未加象样的抵抗,就追随了战时体制的大流。对于这种现象的解释,众说纷纭。作者侧重从体制、思想文化、传统三个方面加以探讨,认为精神思想因素,例如战时体制下的家庭观念、军国

战时体制下的日本妇女团体

主义女子教育、“国家母性主义”、武士道精神、日本民族的集团性、近代天皇制传统意识等,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此外,军国主义的体制因素,也是罪恶之源。关于妇女团体在日本侵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作者用翔实的资料证明了在战时体制下,日本妇女以无谓的牺牲为代价,其经济、社会和政治地位甚至畸形提升。尤其是随着侵略战争规模的扩大,越来越多的男性被派往战场,日本妇女越来越成为后方基地的主力军,角色作用日益重要。上述论证,对客观把握近代妇女及其团体命运的变迁,勾勒了清晰的轨迹。在今天,也有助于加深对日本社会的了解和认知。

作者在来北大读博之前,已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从事科研多年,对日本妇女问题已有相当的学术积累。在北大读博期间,勤奋努力,学业颇有长进。《战时体制下的日本妇女团体(1931~1945)》的出版,既为过去常年努力的成果小结,也是今后继续奋进的新起点。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方能在史才、史识、史德、史学等“史学四才”诸方面进一步拓宽并夯实基础,在新世纪不断展现应有的学术风采。

欣闻作者不辍笔耕,又开始了新著《日本妇女参政运动百年史》一书的撰写工作。期待一部新的学术著作早日问世,其望亦厚焉。

是为序。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宋成有

2005年5月1日

绪 章

—

20 世纪的日本,可以说是被侵略战争和对战争的反省纠缠在一起的 100 年。日本在这个世纪经历了并不算短的几次战争,包括 1900 年加入八国联军侵占北京;1904 年至 1905 年发动日俄战争;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31 年挑起侵华战争,并在 1941 年扩大为太平洋战争。直到 1945 年日本战败投降,规模越打越大的侵略战争几乎伴随了日本 20 世纪前半部分的国家生活。战后初期,盟军对日本进行了占领,并对旧日本进行了全面的改造。借助美国的保护,日本走上了贸易立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但是,最初对战争反省和对战争责任的追究是不彻底的,美国出于冷战需要的有意庇护,甚至使日本不彻底的反省和追究也半途而废。至 20 世纪 60 年代日本崛起为经济大国,肯定“大东亚战争”的逆流,成为经济成就刺激民族主义死灰复燃的典型表现,并呈愈演愈烈之势。直到 21 世纪初的今天,日本仍然没能从战争的阴霾中走出来。日本政府在历次“教科书事件”中篡改历史的顽固立场,对战争反省遮遮掩掩的暧昧态度,自然无法取信于邻国和世界舆论。内阁首相和阁僚接二连三地参拜供奉着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以及国会政客不时的狂言挑衅,多次激起曾遭受过日本侵略的亚洲国家的激烈抗议浪潮。所有这一切,让人感到对于日本及其邻国来说,战争并没有完全成为过去,侵略战争的阴影和梦魇,至今仍困扰着日本。

为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历史不会重演,总结必要的历史经验教训,维护东亚乃至世界和平的发展大局,我国史学界对于有关日本军国

战时体制下的日本妇女团体

主义的许多问题,已经进行了多年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但是,有关战时日本国内妇女和妇女团体的问题,却常被置于次要甚至是被忽略的地位。尽管在漫长历史时期,日本妇女被排除在挑起战争的决定过程之外,但每当战争爆发,日本国家、政府却以民族大义之名,号召广大妇女进行对战争的支持。那么,这一历史现象不禁引起我们的思考,日本这一民族、国家对于日本妇女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日本妇女对于被侵略的民族、国家又意味着什么?实际上,当年日本政府在“总体战”方针下发动的侵略战争,已经将占国内人口一半的日本妇女动员起来,并将其驱入疯狂旋转的战争体制。随着侵略战争的扩大,日本举国狂热地投入血腥的战争体制,妇女更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战争期间的日本妇女不是作为个人,而是通过形形色色的妇女团体,卷入战时体制中的。在战时体制下,握有组织、动员日本妇女权力的官方妇女团体,在稳固后方、维持战时经济生活和鼓舞前方“士气”等方面,发挥了恶劣的作用。因此,要进一步阐述清楚1931~1945年间日本妇女和侵略战争的关系,就必须对战争期间的妇女团体进行系统而深入的探讨,从而在整体上深化我国学术界对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研究。

战争时期,日本国内活跃着不少妇女团体。其中有的团体成立于战前,个别团体甚至可以追溯到明治时代,但更多的团体是在战争期间成立的。在这些团体中,既有妇女自发组织成立的民间团体,如民间自主性的妇女团体—妇选获得同盟,也有在官方授意和直接领导下成立的爱国妇人会、大日本联合妇人会、大日本国防妇人会以及大日本妇人会等妇女团体。有的妇女团体随战争的进程而走向衰落和消亡,有的却因追随政府的战争政策,并随侵略战争的不断升级和扩大而急剧膨胀,成为吸纳了几乎全体日本妇女的全国性妇女团体。这些妇女团体的演变以及在战争期间的一系列活动都发人深思。因此,在1931年至1945年的侵略战争期间,作为日本社团重要组成部分的妇女团体颇具研究价值。

本书所说的“战时”,是指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战败为止的战争期间。为了将这一期间妇女团体的发展演变叙述清

楚,本书以“九·一八”事变后的局部战争、“七·七”事变后的全面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为时间轴,分三个阶段来展开论述。战时体制是日本为了战争顺利进行的国内体制。作为国家总体战的战争是一种不仅要求在军事,而且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所有领域谋求对应战争的强化的国内体制。战时体制不是一朝一夕确立下来的,它有如下一个形成过程:1932年“五·一五”事变到1936年的“二·二六”事变期间的“非常时期”,是战时体制的酝酿时期。这一时期急速膨胀的法西斯主义思潮和右翼团体的暴力事件推动了整个社会的法西斯化,为战时体制的形成起了决定性因素。“二·二六”事变之后,法西斯分子广田弘毅任首相,法西斯主义更加猖獗,军部法西斯几乎完全控制了内阁,在“广义国防”的口号下采取了对外制定侵略扩张的路线、对内加紧对国民统制的一系列加速法西斯化的措施。日本开始了大规模扩军备战,大力扶植和保护经营军火工业的财阀。1936年的内阁预算会议上,通过了庞大的1937年军事预算。扩军备战大大刺激了军事工业的膨胀,短期内增建和扩建了一批军工企业,政府大力扶植外贸,奖励航空、海运事业,国民经济进一步军事化,进入准战时体制。“七·七”事变后为了保证因战争扩大而急需的庞大兵力和军需物资,政府开始迫使日本国民参与战争,1937年9月开始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标志着战时体制的确立。从1940年第二届近卫内阁组成到1945年日本战败的五年期间,是战时体制的最高表现形式——法西斯翼赞体制时期。这一阶段日本国民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受到的严酷统制是日本历史上罕见的。战败后日本解散了陆海军以及国民义勇队等战时体制下的诸法西斯组织。1945年10月相继废除了《国防保安法》、《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临时取缔法》、《治安维持法》等战时法西斯恶法,战时体制宣告瓦解。

在侵略战争的不同时期,随着战时体制的形成和发展,妇女团体也不断发生着变化。在妇女团体与侵略战争关系的研究上,笔者是从以下几个问题来进行思考和阐述的。第一,日本妇女团体与各时期侵略战争之间的关系;第二,战争期间妇女团体的发展和演变;第三,战时民间妇女团体及其领导人“转向”的原因以及妇女运动领导人的战争责任问题;第四,战争期间妇女团体的作用及其历史教训。

战时体制下的日本妇女团体

在探讨上述问题时,笔者主要把握不同的论述层次。在第一个层次,即表面层次上对战时体制下妇女团体的总体状况加以完整的论述。在这个过程中,针对我国日本史研究界关于战时日本妇女团体问题相关资料不足的情况,尽可能地将笔者多年搜集,包括赴日本调查、查阅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充分利用起来,具体而详实地展示战时日本妇女团体的方方面面。第二个层次涉及战时日本妇女团体追随并支持战争的深层次问题。其中,包括近代以“忠君爱国”为中心的女子教育、纳入“家族国家”轨道的家族制度、“男尊女卑”的社会性别区分、“肇国深远”的天皇制等问题,力求从制度、思想文化和传统等方面来分析日本妇女团体参与战时体制的原因。在日本近代女性史中,一个突出的历史现象是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期间,曾经与侵略战争保持距离的民间妇女团体,最终与官方妇女团体合流,并以“贰臣”的扭曲心理,狂热地支持政府的战争政策。通过对这种在战争期间女性史特殊现象的分析,可以更深入地把握日本近代史的特点。第三个层次,是剖析引起民间妇女团体和民间妇女团体领导人立场骤变的“转向”问题。一些妇女运动领导人曾经是近代妇女运动的先行者,在追求妇女解放的道路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然而,在战争到来之际,她们纷纷转向支持政府的侵略政策,沦为支持侵略战争的妇女团体带头人。市川房枝堪称她们之中典型的“转向”人物。当时,不仅妇女界,在工会、无产政党、日本共产党甚至财界,均出现形形色色的“转向”现象,形成战时日本社会的“奇异”景象。那么,妇女界特别是民间妇女团体领导人发生“转向”的诱因、过程和作用是什么?究竟有何特点?这些都是深入探讨战时妇女团体问题的关键所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只有把“转向”现象搞清楚,才真正有助于对战时妇女团体做出恰当的评价,以汲取必要的历史经验教训。第四个层次涉及女性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即战争期间妇女团体的活动与妇女运动的关系问题。在这里,涉及性别与战争、性别与国家、性别与民族等各种关系。战争时期,无疑是特殊的历史时期,战争中的日本妇女,也要受各种条件和环境的制约。因此,在战争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日本妇女的历史定位、妇女与战争的相互关系问题,均值得认真研究。

二

日本学者的研究

目前,日本除东京的综合女性史研究会和京都的女性史综合研究会两大全国性妇女史研究会之外,还有 70 多个地方性研究会。历史学杂志《历史评论》每年都出版女性史专集。一批女性学者是研究女性史的主力军,她们以女性研究者的身份和视角,运用女性史学的理论,在日本近代女性史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取得了骄人的成就,推动了日本近代女性史研究的发展。

把女性作为日本历史上的重要问题,正式提出来研究的是 1936 年 6 月出版的《历史教育》杂志的“女性史特集”,由此山茂夫、横井保平、藤原治等几位学者分别叙述了各时代的民间女性史。^① 20 世纪 50 至 60 年代是女性史研究的起步时期。井上清的《日本女性史》(三一书房 1948 年)的出版,掀起二战后日本第一次女性史研究的高潮。该书共 11 章,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史观分析了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农奴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各个时代日本妇女所处的地位和妇女运动的历史。该著作运用社会发展史、人民斗争史的历史观把女性史作为通史予以论述,对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日本女性史的研究影响很大。归纳起来,其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社会发展史、人民斗争史的史观是研究日本女性史的基本理论;其次,女性史是争取女性解放的斗争历程;再次,日本妇女获得真正解放的道路在于以工人阶级为中心,团结包括农民、市民在内的民众团结斗争之中。除井上清的《日本女性史》之外,《现代女性十二讲》(カウカ社 1950 年)、三井礼子编的《近代日本的女性》(五月书房 1953 年)、高群逸枝的三卷本《女性的历史》(讲谈社 1954 年~1958 年)等,也是日本 20 世纪 50 年代有影响女性史著作。高群逸枝对日本女性史的研究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她认为

① 参阅井上清:《日本妇女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4 年,初版序言。

战时体制下的日本妇女团体

日本女性史的特殊性是残存的封建性不可避免地在妇女运动中反映出来。

1931年至1945年期间日本女性问题的研究,是日本女性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时期。然而,在战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战时日本妇女的研究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20世纪70年代以前,相比大正时期妇女运动以及战后妇女运动的研究,对战争期间日本妇女问题的研究成果不多,某些对战争期间妇女问题的论述被淹没在近代女性史的叙述中。有的即使作为一个章节被提及,也未能展开来详细论述。像井上清的《日本女性史》和高群逸枝的《女性的历史》等女性史通史,由于论述的时间跨度较长以及篇幅限制,对1931年至1945年侵略战争时期日本女性的历史论述不足。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50~60年代,一些经历过战争的妇女运动领导人出版了她们的回忆录,如平冢雷鸟^①的《我的路》(新评论社1955年)、奥梅尾(むめお)的《我的履历书》(《日本经济新闻》,1957年1月至2月连载,1967年结集出版)、宫本百合子的《妇人与文学》(实业之日本1948年)等,为战时女性史的研究留下了第一手宝贵资料。

70年代中期之前,日本史学界对战时妇女问题研究不足的原因,村上信彦在其《日本的妇女问题》一书的第六章“战时的妇女劳动”中曾明确指出:“迄今为止的女性史研究中,如果说存在盲点的话,我想就是战争期间。反思为何这一时期的叙述如此笼统、不细致,只是强调妇女的生活被军国主义国家权力所摧毁、妇女被驱赶到支持战争的生产战线上,而缺乏对战时生活状况的调查、报告。想想实在觉得不可思议,几乎难以置信日本存在持续十五年^②的长期战争的激荡时代(略)。这么重要时期的女性史几乎被无视、轻视的理由,我想是因为战时几乎全部女性都(被迫)支持战争,即屈服于当权者的意志对战争进行了支持

① 日本妇女解放思想家,原名平冢明子(1886年~1971年),笔名平冢雷鸟。

② 日本学术界通常将1931年9月18日的“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9月2日在投降书中正式确认接受《波茨坦公告》这段历史时期总称为“十五年战争”。

这一事实。从站在妇女解放立场上的女性史的角度,这段时期没有任何正面因素,也就是说是女性史负面的时代。”^①

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近代女性史史料、团体史、学校史编辑、传记、自传的出版进入兴盛时期。1969 年~1972 年出版了 4 册村上信彦所著的《明治女性史》。女性史综合研究会编著的《日本女性史》共 5 卷(东京大学出版会 1983 年),分原始·古代、中世、近世、近代、现代 5 部分,其中第 4 卷与第 5 卷与本书的研究相关联。从 1976 年 2 月到 1981 年 7 月历时 5 年零 5 个月,由市川房枝等人编辑了 10 卷本的《日本妇女问题资料集成》(ドメス出版)。这 10 卷分别为:人权、政治、劳动、教育、家族制度、保健·福利、生活、思潮(上下)以及近代日本妇人问题年表。该资料集是研究日本近代女性史的基础史料,也是本书写作过程中重要的参考资料之一。

关于战争期间妇女团体资料集的出版,当推《爱国·国防妇人运动资料集》。这套资料集共 9 卷,附别册 1 卷,由千野阳一主编。该资料集囊括了爱国妇人会、大日本联合妇人会、大日本国防妇人会以及大日本妇人会四大官方妇女团体创立的经过、宗旨、活动纪录、团体相关人士发表的文章以及当时珍贵的历史照片。资料丰富而详实,为战时妇女团体研究提供了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另外,铃木裕子解说的《日本女性运动资料集成》(全 10 卷,附别卷 1 卷,不二出版),收集了从自由民权运动到战败约 70 年间日本女性的历史记录,是研究日本妇女运动的珍贵资料。

研究日本战争期间的妇女团体,离不开对当时妇女活动领袖人物的研究。市川房枝纪念会主编的《市川房枝集》(全 8 卷·别卷 1)以及新宿书房出版的《市川房枝自传·战前编》,收录了战争期间妇女运动领导人市川房枝所写的大量文章以及自传,是研究近代妇女运动历史、市川房枝的思想构成及其战时思想“转向”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另外,女性史学界也出版了一些研究成果索引和文献目录,如女性史综合研究会编著的《日本女性史研究文献目录》(东大

① 村上信彦:《日本的妇女问题》,岩波新书,1978 年,第 164~165 页。

战时体制下的日本妇女团体

出版会 1988 年)给研究带来了很多方便。三井礼子编著的《现代妇人运动史年表》(三一书房 1963 年)也对日本女性史研究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受西方史学界影响,以及日本近代女性史史料、传记和自传的大量出版,将日本女性史的研究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女性史越来越受到日本学术界的关注,特别是战时体制下被称为“銃后”^①的日本国内妇女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重视。二战后,不少日本学者直面战争责任这一沉重课题,在研究战时体制时对战争进行反思,承担作为日本国民所应负有的战争责任。日本战后在战争责任问题上大致有四个高潮期。第一个高潮是在日本战败后的 1945 年到 1949 年,第二个高潮是 50 年代后半期,第三个高潮是 70 年代后半期至 80 年代前半期,第四个高潮是 90 年代末期。在对日本战争责任进行反思时,日本妇女的战争责任问题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被搁置起来或被视为禁忌。1991 年 12 月,战争中被强征为“从军慰安妇”的金学顺等三位韩国妇女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对个人予以赔偿的诉讼,给战争期间的日本女性史学研究带来了决定性的转机和“女性·战争·人权”学会的诞生。日本学术界对战时体制下妇女的研究也因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90 年代以来,民族与性别的话题在世界范围内也被广泛提及。

随着女性学这一新兴学科在世界范围的兴起,女性学理论、特别是性别理论对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20 世纪 80 年代,女权主义者主张女性是历史的主体而不是客体。据此,日本女性史学界也开始由女性的“被害者史观”转向“加害者史观”,有的学者开始追究战争期间日本妇女支持战争、参与战时体制的责任。这一新的女性史动向被称之为“反省的女性史”。^②对战争期间女性问题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探讨妇女解放运动的挫折和抵抗失败的原因,主要以妇女运动

① “銃后”一词是日文,“銃”的意思为枪,“銃后”即后方之意。战争期间指日本国内。为保持历史感,本书在引用时未加翻译,如“銃后奉公”等,特在此予以说明。

② 上野千鹤子:《民族主义与社会性别》,青土社,1998 年。

领袖为研究对象。二是把普通女性作为战争牺牲者,从这一角度进行研究,出版了传记、战争体验、回忆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大量研究战争期间日本国内妇女问题的专著和论文。学术界对战争期间妇女的思想和行动及其评价非常关注。永原和子和米田佐代子的《女人的昭和史》(有斐阁1986年)作为通史,具有独特的生命力。铃木裕子的《女性主义与战争——妇女运动家的战争协力》(マルジュ社1986年)、加纳实纪代的《女性们的“銃后”》(筑摩书房1987年)、1984年《历史评论》3月号出版的《十五年战争与女性》专集、川名纪美《女性也加入了战争》(冬树社1982年)等都把战争期间的日本妇女作为研究对象。石月静惠的《两战期间的女性运动》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妇女运动分为地域妇女运动、市民妇女运动以及无产阶级妇女运动三部分。从妇女运动的视角来解释侵略战争期间妇女运动的统合。村上信彦在其著作《日本的妇人问题》中认为战争对日本妇女不完全是负面影响,也有两点正面影响。一是战争期间日本主妇几乎都被大日本国防妇人会、大日本妇人会等组织吸收,妇女从狭小的厨房走了出来,活动空间比以往扩大了。另外,战时女子征用政策使得封建的家族制度受到冲击而弱化;二是战时妇女参加劳动。尽管劳动强度大,但也有不少不是被强制而是积极参与劳动和奉献的妇女。他的这一观点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铃木裕子在《女性主义与战争——妇女运动家的战争协力》一书中认为村上信彦过分强调日本妇女在战争期间的“热情”和“奉献精神”,对他以超越阶级的视角看待日本战时妇女问题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她认为不能仅仅从妇女劳动的热情和被“圣战”所鼓动起来的“奉献精神”作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还要看到妇女们参与广泛社会生活和劳动的结果是帮助和支持了侵略战争。

在对战争期间的妇女团体研究、特别是家庭主妇的组织化研究方面,藤井忠俊所著《国防妇人会——日章旗与围裙服》(岩波书店1985年)、广濑玲子所著《妇女的战争参与——大日本国防妇人会论》(《民众运动与歧视·女性》雄山阁1985年)是两部最重要的著作。这两部著作详细论述了国防妇人会的成立经过、活动和发展状况。但这些研究只是对这一妇女团体的个案研究,没能将其置于日本近代妇女史的广阔

战时体制下的日本妇女团体

背景之中,因此,没能揭示战争期间妇女团体纳入战时体制的本质因素。涉及对爱国妇人会的研究有:宫坂广作的《近代日本社会教育政策史》(同志社 1966 年)、《近代日本妇人教育史》(ドメス出版 1979 年)、永原和子《大正、昭和期农村地域妇人团体的社会机能——围绕爱国妇人会茨城支部》(《茨城县史研究》1976 年)、《奥村五百子》(《日本人物史大系 6》朝仓书店 1960 年)、佐治惠美了《军事救护与家庭妇人——初期爱国妇人会论》(近代女性史研究会《女性们的近代》柏书房 1978 年)等,另外还出版了《爱国妇人会四十年史》、《漫谈爱国妇人会的梗概》等著作。对大日本联合妇人会的研究有阿部恒久的《大日本联合妇人会小史》、千野阳一的《近代日本妇人教育史》等。

关于妇女团体与战时体制关系、三、四十年代妇女团体的合并问题、妇女运动家和民间妇女团体的“转向”问题,均有不少学者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述,堪称战时妇女问题研究的重点。特别是在妇女运动家、教育家对政府战争政策的合作问题上研究成果较多。米田佐代子分析了战争期间母性主义与女权主义思潮为何转向支持战争,以及日本妇女们被煽动起来的原因。她在《平冢雷鸟的国家观——国家与女性的一个考察》(《历史学研究》1985 年 6 月)一文中将平冢雷鸟同与谢野晶子比较,从母性保护论争中两人国家观的不同,挖掘她们在战争时期向国家政策倾斜的原因。崛场清子从女性与国家的角度阐述了国家对日本女性的影响。另外,米田佐代子《女性的昭和史》(有斐阁 1986 年)、永原和子《女性为何支持战争》(《日本近代史的虚像与实像》3 大月书店 1989 年)也论述了妇女对战争的参与。鹿野政直的《法西斯下的妇女运动——以妇选获得同盟为例》(《家永三郎教授退休纪念论文集》2《近代日本的国家与思想》,三省堂 1979 年)研究描述了“九·一八”事变前后妇女参政运动及其在军国主义的压制下逐渐后退的过程。石月静惠的《1930 年代的无产阶级妇女运动》(《日本女性史》5,东大出版会 1982 年)论述了 30 年代无产阶级妇女运动走向消亡的过程。

从 1991 年开始,战争期间韩国女性被强迫充当日军慰安妇问题引起世人关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也将该问题作为一个国际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这一系列事件引起了日本国内对民族主义以及